

热点聚焦

以新一轮改革开放应对国际经贸变局

□ 马建堂

“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事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事关世界繁荣与稳定。美国一些人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挑起对中国的经贸摩擦，损害两国和全球利益。对中美经贸关系怎么看、怎么办，需要用历史视野和战略眼光去审视，分析现状、澄清事实，着力办好我们自己的事。

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经贸关系是否健康稳定，对两国及全球经济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美国优先”口号下，美国一些人罔顾贸易互利共赢的本质，挑起对中国及世界多个国家的经贸摩擦，掀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逆流。对此，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冷静分析。

其一，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是客观事实。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历史经验、重要基础和关键所在是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长期以来，两国政府本着平等、理性、相向而行的原则，经过不懈努力，建立了中美商贸联委会、战略经济对话等一系列沟通协调机制，保障了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美经贸合作形成了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赢关系，惠及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惠及世界各国和人民。

中国主动拥抱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美国等加强经贸合作，推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发展的市场空间。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2018年中国货物贸易达到4.62万亿美元；利用外资1349.7亿美元。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坚定地走对外开放之路是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同时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优势的扩散，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质量提升，尽管这都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市场行为基础上，但也是中国人民所认可的。

美方也在中美不断密切的经贸往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降低了美国消费成本和通货膨胀，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数据，美中贸易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2017年美国在华企业约6.8万家，实际投资830亿美元，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分享日益扩大的中国巨大市场红利。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购买金融产品和直接投资极大地弥补了美国国内储蓄的不足。据测算，美对华出口和双向投资节省了美国260万个就业岗位，提升美国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此外，中国市场还是美国跨国公司的重要利润源，2015年仅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在华合资企业利润就达74.4亿美元。另外，对华经贸合作还促进了美国产业升级。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一方面降低了资源

贸易霸凌主义罔顾贸易互利共赢的本质

- 中美经贸合作形成了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赢关系，惠及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惠及世界各国和人民
- 贸易逆差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直接借口，但其认识存在明显的偏见

消耗和环保压力，另一方面也使美国集中力量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使美国的比较优势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

其二，美国挑起贸易战是基于违反常识的霸凌思维。贸易逆差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直接借口，但其认识存在明显的偏见。

从交易本身看，做贸易是你情我愿，双方都有好处才可能成交，不是“卖得多买得少”就占便宜、“买得多卖得少”就吃亏，实际上买卖双方只是财富形态的变化，卖方获得货币形态的财富，买方获得实物形态的财富，各得其所。对此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法国出口一批货物，用所得的钱从国外购买一批商品，但在海运途中不幸遭遇风暴，进口产品全部掉入海底损失掉了，但是，在法国的统计上却出现了大量顺差。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即使国民福利受到损失，也可能出现顺差；反之，即使出现逆差，国民也可能获得了大量福利。

从统计口径看，以原产地为基础的货物贸易总值统计，已明显不适用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深化的现实，所以才有出口增加值计量、跨国公司关联交易、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等新统计方法的出现。比如，按传统的贸易总值方法计算，2016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为3851亿美元，对美顺差2507亿美元，但由于不少核心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甚至半成品是在第三方生产的，中国境内只是加工总成出口。若按贸易增加值核算，扣除第三方所创造的价值，在我国境内新产生的出口到美国的贸易增加值仅有2488亿美元，从美进口增加值为1094亿美元，增加值顺差只有1394亿美元，较总值方法计算的结果减少44.4%。这只是统计视角的第一个维度。随着全球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经贸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国一直是逆差国，2016年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380亿美元，中国货物贸易的增加值顺差减去服务贸易的逆

差，2016年中国对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总体顺差只有1014亿美元，比按总值统计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减少了1493亿美元。这也只是统计视角的第二个维度。实际上，同中国以在国内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为主的经济贸易模式不同，美国更依赖在中国投资办厂、直接销售给国内。2016年在华美资企业销售额约3453亿美元，但在中美资企业销售很少，2016年只有345亿美元。在跨国公司跨境销售上中国有3108亿美元的“逆差”，比中国对美贸易增加值和服务贸易顺差多2094亿美元。综合考虑货物增加值贸易、服务贸易及跨国销售因素，中国对美国经济贸易“顺差”完全逆转。

从美元流向看，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是全球支付、结算和储备的最重要的币种。中美货物贸易顺差获得的美元，绝大部分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又流回美国。多年来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中美经贸和金融的深度融合，实际上形成了美国用自己印刷的纸币（美元）购买中国真金白银的产品，中国再用换得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大循环。中国成为美国人民消费品的最大提供者、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融资。这一循环谁吃亏、谁受益，公道自在人心。

总之，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加速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促进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促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提升和宏观经济的平衡。中国并非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逆差，根本原因是中美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链全球再分工形成的。美国部分社会群体失业主要是国内经济政策失误和再分配、再就业机制缺失导致的。美国不着力解决自身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而是企图通过指责和打压他国的方式转嫁国内矛盾，扼制他国发展，维护世界霸主地位，只会降低全球经济效率，使自由贸易、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

国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总体上是内需主导，巨大的市场空间将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没有改变，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达6.4%，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的质量不断提高，产业升级进程持续推进。美方以贸易逆差、技术转让、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等问题为借口，对我国挑起贸易战，试图打压我国经济，阻滞我国发展进程和现代化进程，这些想法是一厢情愿、难以实现的。

总的来看，世界经济已经深度融合，实际上谁也离不开谁。回归合作共赢才是中美交往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正道。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人类发展的总趋势，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繁荣、稳定，中美双方命运与共，都应多做利人利己之事，拒绝损人利己之道。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主张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坚定维护并推动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促进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友好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立足自身需要 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

- 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出发，以我为主把握战略主动，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内部动力，主动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准入限制，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通过高水平开放，使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使中国始终是外商云集的投资热土，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充满活力的大市场。

第三，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改革全面深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开放与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部条件，开放为改革提供全球视野和外部活力。改革任务重的领域，往往开放不够；开放难度大的领域，常常是改革要解决的痼疾。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亟需对外

开放这一强大动力助力。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不动摇，建立健全开放与改革的联动机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开放方案，加强内外联动、上下联动，以开放倒逼改革，倒逼产业升级与企业自强，焕发经济体制整体活力。

总之，中美经贸摩擦带来外部环境明显变化，但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所处的历史机遇期并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出发，以我为主把握战略主动，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内部动力，主动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研究员）

专家观点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上近期美国一些人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出口增长带来不小挑战。如何应对？我们认为，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扩大内需。目前，我国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爬坡阶段，内需潜力巨大。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内需的潜力释放出来，外需不足内需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需求与供给是对立统一的。没有需求的供给必然带来产能过剩。没有供给的需求只能是望梅止渴。经过40年快速工业化，我国已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在需求方面，我国人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消费已经满足，正处于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转变的阶段。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呼唤供给结构的调整优化，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供给不仅能够满足需求，而且能够创造需求。我们不仅要通过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提高人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满足和创造需求。当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内需潜力的重点应当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技术创新带动制造业升级，满足市场需求。目前，我国在一般传统制造业产品产能过剩的同时，一些高精尖产品、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名牌产品仍处于短缺状态，包括芯片、航空发动机、新材料、清洁能源等，企业能够进口。哪个企业能够通过自主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就能获得发展的商机。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企业联盟，促进产学研结合，集中资金、人才等要素，对重大关键技术实行联合攻关，成果共享。要竭尽全力尽快突破卡脖子技术，打破国外对技术的封锁和垄断。贸易战的本质是科技战，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打压和对高科技产品进口的封锁，目的是否认我国的发展权。在这样的形势下，奋发图强，以技术创新带动制造业升级，发展强大的先进制造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是唯一选择。

第二，以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释放新动能。截至2018年末，我国农村尚有5.6亿人口，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缺乏竞争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必将释放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印发，提出了到2022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目标，从要素市场、公共服务、乡村经济、农民收入等方面对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为我国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凝聚城乡发展合力、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针对造成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原因，提出了促进城市资本、人才、技术向农村流动的举措，对农村土地包括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允许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允许就地入市或异地调整入市；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城中村、城边村、村级工业园等可连片开发区域土地依法合规整治入市；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房地一体、分割转让”。以“三块地”为平台，撬动各类要素下乡，必将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农业现代化将激发大量农业机械、农业设施和水利建设的投入；新农村建设将激发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大量投入；农民市民化将对城市建设提出巨大需求。如果说前40年我们主要依靠工业化、城市化拉动了经济增长，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新的强大动能。

第三，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切实补短板。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文化、法律、咨询、审计、市场中介服务、资本市场服务等供给短缺，成为当前供给结构中的明显短板。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必须改革供给管理体制，扩大市场准入，发挥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可考虑建立公共服务价值补偿机制，使公共服务投资能够获得合理回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机制。为此，要建立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机制，赋予公共服务业投资项目相应的政策。需要认识到的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一个公共服务业不能有一个较快发展，满足广大居民需要，主要责任在政府，努力使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这方面，各级政府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以高质量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第四，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数字经济发展。随着信息技术进步，智能化社会和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引领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移动支付、网络金融、共享经济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同步甚至领先水平。应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在形成国际标准后，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条件。在优先搞好国内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逐步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更多国家的人民受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当期需求和未来发展影响巨大，应充分论证，力求寻找最优方案，避免投资失误和浪费。

此外，发展煤炭清洁燃烧技术，降低对进口油气的依赖，亦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近年来，我国通过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有所降低，但近期内主要依靠煤炭的局面难以改变。发展煤炭清洁燃烧技术是立足于国内资源的必然选择。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工作，把握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强相关技术攻关和设备研制，加大推广利用力度，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总之，瞄准上述几个领域集中发力，就能迅速形成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较快增长，从而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分别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研究二部主任）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内需潜力

□ 郝新立 刘森